

往事如昨

那一年我“砸锅了”

刘甲凡

“要饭得有个窝(屋子),家穷得有口锅”,这是过去的一句民间谚语。“窝”是栖身之所,锅是做饭工具,离开这两样,就无法正常生活了。早些年在我们乡间,跨进堂屋就是灶房,通常布置着一盘石磨、一口水缸和两口大铁锅,用来磨面、贮水、做饭,家家如此。

铁锅尺寸的计量单位是“印”,指的是锅口的直径。用“印”作为其计量单位历来观点不一,众说纷纭。有一种说法,“印”指的是刚满月孩子的脚印,脚印的长度等于“印”;还有一种说法,“印”指的是烋玉米饼子时留下的印痕,八印锅即可以在锅边烋八个玉米饼子。农村妇女烋玉米饼子时,每个饼子所用的料刚好可以填满自己的手掌,每个饼子的大小也差别不大,老百姓用“饼子印”作为铁锅的计量单位,算是情深所致吧。

在我们家乡,也有人把“印”说成是容量单位,“印”是“人”的转音,八印锅就是可以供应八个人吃饭的锅。

但这些说法都与现实情况不符,我亲自动手丈量过不下百十口铁锅,始终没得到准确的标准。我也曾多次翻阅《说文解字》等书籍,一直没找到关于“印”字作为计量单位的记载。因此,可以确定的是,“印”并不是精准的计量单位,只是约定俗成的一种叫法,是一个大致范围。比如同是八印的铁锅,测量的数据一口可能是65厘米,另一口可能是66厘米,还可能是68厘米。其他印数的锅也一样,都是一个大概的数据。这可能是因为铁锅本身不是什么贵重物件,不必过分精密。再者,过去铸造铁锅的都是小土作坊,并没有太多定型的专业设备。早年间手艺人做东西,往往“眼是尺,手是秤”,不需要专业的测量工具,铸造出来的铁锅,只要光滑、厚重、耐用即可,至于尺寸大一点或小一点都无大碍。普通庄户人家大多使用六印或八印的铁锅,更大号的多用于粉坊、油坊、豆腐坊、屠宰户或单位食堂。

大铁锅与人们朝夕相处、息息相关,因此,围绕大铁锅说事的民间谚语就特别多。像说起过日子的三大愁事,就是指“破锅、漏房、病老婆”;形容生活十分困苦,就说是“穷得揭不开锅了”,或者说“把锅吊起来当钟敲——穷得叮当响”;当不惜一切代价,豁上老本要做某一件事,就说是“砸锅卖铁也要干”;当一个人蒙受不白之冤,就说他是替别人“背黑锅”;若说起亲戚之间的关系,就有“是锅热起炕,是亲三分向”这样的俏皮话。还有一句谚语叫“砸锅了”,指的是把事情办砸了、惹了祸。对于这句谚语的寓意,我的体会可谓深刻,因为有一次我实实在在“砸锅了”。

那是1960年秋天,我们村开办了两年的大食堂解散了,“三年困难时期”最艰难的阶段开始了。不仅粮食严重不足,还有一件要命的事,由于1958年“大炼钢铁”期间,把家家户户做饭的大铁锅都砸碎了做炼铁的“铁引子”,现在食堂没了,一下子也没有那么多铁锅分发到各家各户,只能采取左邻右舍共用一口锅的法子了。

我家和东邻五爷爷家分到了一口锅,为了能使两家做饭用锅时尽量不误时,我妈妈和五爷爷费尽心思,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轮流用锅的时间表并严格执行。每当五爷爷家先做饭,饭做熟后,他就把锅摘下来放在院子里,然后冲着我们家大喊一声:“好啦!”我们家就过去把锅抬回来。轮到我们家先做饭,也是如此。

那一年我10岁,哥哥12岁。每次去五爷爷家搬铁锅,妈妈不放心,每每都会叮嘱一句:“小心点,抬不动了就放下歇会儿,千万别摔坏了。”因为我力气太小又愣头愣脑,有一次手指头被锋利的锅边划破出血了,可即便这样也没敢贸然松手,因为我知道,一旦把铁锅摔破了,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情。

俗话说:“盼什么没什么,怕什么来什么。”“砸锅了”这种倒霉事还真的让我给摊上了。

我清楚地记得,那天是1961年大年初六,民间“送穷”的日子。妈妈一大早还偷偷在院子里烧了几张纸钱,说是把“穷神”送走了。当听到五爷爷的喊声,我和哥哥就麻溜溜地去他家把铁锅抬回来,此时我们的肚子早就“咕咕”叫了。

我们两家虽然属“贴山(墙)”的邻居,可我们家走北门,五爷爷家走南门,从我们家到他家要绕一个大圈子。由于前两天刚下了一场雪,路上滑溜溜的。哥哥力气大一些,他在前面退着走。我在后面,双手抬着铁锅本来就近不开步,一不留神脚下一滑,一个趔趄就摔倒了,大铁锅也随之“砰”的一声摔在路上。

摔倒的一瞬间,我的左手碰在锅边上,手掌被划出一道口子,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。我爬起身,赶忙用右手按住流血的伤口。可是还没等我喊痛,就听哥哥惊叫一声:“锅摔碎了!”这可把我吓坏了,也顾不得手上的血往下流,撒腿就往家里跑,大声喊着妈妈。

妈妈和五爷爷都来了,他们仔细检查了一下,说是这口铁锅太薄了,就这么一摔,居然裂了一道一捺多长的口子。不过,事已至此,别无他法,只能找个漏匠打铜子了。

离我们村三四公里远有个沙家庄,他们村有好几个人都是干漏漏匠这个行当的。妈妈立马把铁锅放到鸡公车(方言,独轮手推车)上,要我哥哥帮着拉车,急溜溜地往沙家庄赶。一旦去晚了找不到漏漏匠那就麻烦了,我们两家还等着铁锅做中午饭呢。至于我们家还没吃早饭,就顾不得那么多了。

做午饭前妈妈回来了,锅补好了。漏漏匠看妈妈是一个小脚女人太难了,8个铜子只收了4毛钱。这一次我虽然惹下“砸锅了”这样的大祸,但妈妈一句也没批评我。当她安顿好铁锅,查看我的伤口时,妈妈“吧嗒、吧嗒”落泪了。

两家人轮流用一口锅的日子,虽然也就3个多月的时间,但我们村却先后发生了3起“砸锅了”的糗事。个中滋味,我一辈子也忘不掉。

乡村记忆

拔水与捞筲

宋世民

拔水这个词,现在说起来人们会感觉很生分,但是在很多年以前,烟台市民吃水多来自敞口井,拔水这个词说起来特顺溜,老少皆知,因为这是居家过日子非干不可的营生。

当年坐落在大街小巷的水井,样式大同小异,因濒临海边,市区北半部多为溲水井,适合食用的甜水井则分布在地势较高的南部,井筒也显得格外深。通常在离井口三四米外,会围砌一道圈护的矮墙,有的井口盖有碾盘大小的青石,中间凿一放水筲的圆洞,也有的只用大块硬石护沿。天长日久,井口石的边缘都被井绳磨得浑圆光滑。站在井边往下看,黑幽幽的井筒似乎深不可测,湿漉漉挂着青苔的井壁,不时地往下滴着水珠,传出叮叮咚咚的响声……在我童年的印象中,除了手压机井外,从敞口井往上提水,只能靠那根很长的井绳。我那时没有想到,日后我还真与拔水这活儿结下了一段缘分。

上世纪50年代后期,每逢农忙季节,机关、企业、学校等纷纷抽人赴郊区农村帮生产队干活。我们学校也是年复一年拉着队伍游走四乡。每次驻扎,都是自起锅灶供餐,分配给我的任务总是不重样:为伙房挑水,供近200人食用。于是,摇水车、挽轱辘、拔井绳、抡担杖(在荒沙滩浅水坑取水时,必须将担杖横着抡出去,近处水太浅,放不倒水筲,还会将水底泥沙带上来)……各种提水方式,我轮流尝试。

1959年夏天,我们来到福山仇村。伙房设在一处菜园的闲屋里,百米开外有一口水井。因临近河滩,井里水位挺高,村民都是用担杖代替井绳拔水。之前我没用担杖拔过水,心里没底,便先到井边仔细端量人家打水的动作,感觉用担杖拔水挺实用,简单利落,免去摇轱辘、拔井绳的麻烦。于是,我兴冲冲地回伙房挑来一对水筲,仿照别人的样子,不紧不慢地将水筲梁挂到担杖钩上,再把担杖伸到井筒里。待水筲底部刚好触到水面,我手臂猛地一抖,只听“哗啦”一声响,探头一看,只见脱钩的水筲正徐徐地倾斜下沉。我急忙卧倒在井口边沿,用担杖去捞。但为时已晚,我无可奈何地瞅着水筲徐徐沉入黑洞洞的井底。吃一堑长一智,我再仔细揣摩别人的打水动作,修正偏差,而后再放一水筲,照旧又不见了踪影!这一下我慌神了,眼看到了做午饭的时间,不敢再试,急忙跑回村里借来井绳,拴紧水筲

梁,顺进井里灌满水,一把倒一把往上拔,宁愿费时麻烦,但求稳妥实效。

午饭后,我找到炊事员中年龄最大的卜师傅,请他帮忙捞水筲。卜师傅并不着急,指着伙房门外摆成一溜的水筲说:“别焦急,咱借了老乡30多只水筲,够你掉一气儿的,慢慢学吧。”有了卜师傅这句话,我心里踏实了许多,再去打水,手腕也显得灵活了,随意一抖,那水筲竟没脱钩!我心里一阵惊喜,并不急于提水上来,而是握住担杖,将已灌满水的水筲,尽情地在井水里上下墩了几个来回。听着井下“扑通、扑通”的水声,我很是开心,好像办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

虽然连续几天都有掉水筲的记录,但我的拔水技术却大有长进,提上一筲水,也就是几秒钟。当时生产队放工都很晚,村民夜里去挑水大多照着手电筒,我却能在暗夜中摸黑把水挑回来。听着卜师傅和老乡的赞许,我洋洋得意。只是后来听说村民用手电筒,主要是防避踩着蛇,我这才感到有点后怕。我白天也曾在井台附近看见过蛇,夜里没被蛇咬伤,实属侥幸。

一天晚饭后,月明星稀。卜师傅不知从哪里借来一个专门用来捞水筲的四齿小铁锚,约我来到井台。他缓缓地沉下小铁锚,漆黑的井里隐隐传出微弱的金属碰撞声,周围静悄悄的,水下的声响听着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。卜师傅慢慢上提锚绳,我用手电筒一照,只见一只水筲已经浮出水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整整捞出十三只!月光下,看着摆满井台的水筲,我心里很感激卜师傅,若不是他鼓励我,没有一次次掉水筲的经历,我根本就学不会用直钩担杖拔水。

许多年后,有一次我出差住进一个小山村,走在街头,恰遇有村民用担杖拔井水。我一时手痒难耐,极想展示一下自己的看家本领,不顾人家婉言相拒,硬是讨过担杖。不料刚接手,便有一丝陌生,原先有十足的把握,瞬间便烟消云散了。众目睽睽,骑虎难下,我硬着头皮弯腰挥臂,只一下,那只崭新的白铁皮水筲便沉底了。当时那个尴尬的情景,至今记忆犹新。幸好对方厚道,并没责怪,还安抚了我几句,听那话音,他早知道我一定会把水筲掉到井里。我本想辩解:“本人曾经身怀‘绝技’”,可话到嘴边,又说不出口。毕竟那是旧事,眼前将水筲一下子掉进井里,却是有目共睹的……